

城镇居民教育公平感的经验分析

陈济冬, 罗楚亮

[摘要] 本文基于我国五省份的家庭住户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居民教育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本文考察了教育公平感的四个维度: 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和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结果发现, 性别、单位性质、小孩成绩、家庭教育支出以及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教育公平感。此外, 教育公平感不只取决于个体对教育系统的感知, 还取决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感知, 特别地, 关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对教育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公平感受到收入分配等其他社会特征的影响。此外, 教育费用的分摊机制会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来改善人们对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

[关键词] 教育公平感; 招生制度公平感; 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

一、引言

教育和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一样, 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福祉。教育作为一种重要公平品的供给, 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 也会直接影响到居民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认知。教育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具有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因此社会公众对于教育的公平性也尤为关注。在学术研究上, 教育的效率和公平性一直是教育经济学学科讨论的重要议题。在教育经济学的文献中, 已经有部分文章讨论了教育的效率和质量。成刚和孙志军(2008)用学生数作为教育产出的一个度量研究了我国高校从1998年到2005年的效率状况。他们发现高校效率在区域之间和不同层次(硕士和博士)之间的差异, 并探讨了学校的

[收稿日期] 2017-05-01

[作者简介] 陈济冬,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chenjidong@bnu.edu.cn; 罗楚亮,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luochl@bnu.edu.cn。

外部和内部因素对学校效率的影响。刘泽云和邱牧远(2011)以“211”大学作为高质量大学的标准,从劳动者工资的角度来研究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效果。同时,他们也探讨了影响个体接受高质量大学的个体因素。杨娟和丁建福(2010)探讨了如何从制定政府行为评价指标的角度入手,以促进其在教育领域的三方面职责:保障、公平和质量。

教育经济学者也越来越关注居民对教育的主观满意度。吉文昌(2015)讨论了测评教育满意度的原则和方法,强调了居民对教育体系的主观感知是教育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提出“以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所思、所想、所盼为确定教育满意度测评内容的出发点”。满意度是一个综合的主观指标。正如公平正义是一般意义上衡量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维度一样,居民对教育公平的感知也是其对教育的综合满意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田慧生等(2016)基于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学生和家长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受到教育期望、质量感知和公平感知的正向影响。他们的结果还表明教育公平感知还通过质量感知间接影响总体满意度水平。基于统计分析的结果,田慧生等(2016)提出了可以通过提升公平感知提高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而文中并未提及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居民的教育公平感。特别是,关于教育公平感的大部分研究通常都缺乏可靠的经验基础,很少从微观层面讨论人们对于教育公平性的主观评价。

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大多从教育的结果或表现来间接推断教育的公平性(胡洪彬,2014)。孙阳、杨小微和徐冬青(2013)探讨了如何通过客观的经济社会数据扩展我国教育公平的指标体系。吴岩(2014)从教育公平的视角分析了广州市初中阶段教育补习现状。胡洪彬(2014)对教育公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中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教育的公平与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机会在不同人群组的分割性,如农民工子女不能进入城镇的公共教育系统;二是教育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配置差异,如城乡之间教育投入的差异、不同类型学校的生均教育经费差异;三是家庭环境对孩子教育投入、教育结果上所具有的重要影响。这些研究对于揭示教育公平性中所存在的问题都给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理解,也对完善相关公共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教育的公平性固然与客观的教育结果或教育表现密切相关,但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教育结果或教育表现来讨论教育公平性,大多是研究者或决策者的思维。本文试图基于住户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描述人们对于教育的公平观念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首次运用我国家庭住户微观调查数据对居民教育公平感进行经验分析,并从四个具体方面来度量教育公平感: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高中招生

制度公平感、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以及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我们发现,性别、单位性质、小孩成绩、家庭教育支出、以及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教育公平感。这些实证经验发现是首次从微观层面刻画了教育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是对已有的从客观角度研究教育公平(胡洪彬,2014)的补充。

此外,我们还发现教育公平感不只取决于个体对教育系统的感知,还取决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感知,如对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在教育公平的客观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中,郝文武(2011)认为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应该相互促进,而薛二勇(2010)认为教育政策的公平可以促进社会其他因素的公平分配。我们的研究从主观认知的角度印证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相互联系。在实证结果中我们还发现,提高奖助学金和勤工助学的力度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来改善公民对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这进一步说明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对于教育公平感知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二、数据描述

(一)教育公平感的总体状况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进行的我国五个省份(辽宁、安徽、广东、重庆和甘肃)家庭住户微观问卷调查数据。每个省份涵盖600户被调查家庭,总计样本量为3000个住户。在这次调查中,专门设计了直接询问居民公平感的相关问题,要求家庭户主或主要成员回答。关于教育公平一共设计了如下5个问题:

- <H617>您觉得当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公平吗?
- <H618>您觉得当地的高中招生制度公平吗?
- <H619>您觉得义务教育阶段的分区招生制度公平吗?
- <H620>您觉得当前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公平吗?
- <H621>您觉得当前的教育收费制度公平吗?

本文的关注重点在于接受教育的过程,因此讨论中不涉及到“大学毕业生毕业分配制度”的公平性。本文对教育公平性的讨论主要限定在不同阶段的招生制度以及教育收费,分别简称为“高考招生”、“高中招生”、“义务教育”以及“教育收费”的公平性,前三个问题体现的是公众对于不同阶段教育机会公平性的主观评价。要求被调查者在“很公平”、“比较公平”、“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之间选择,对于无法判定或不愿意回答的情形,被归入“不知道”。

本文所讨论的这四种情形下的教育公平感分布特征如图1所示。从中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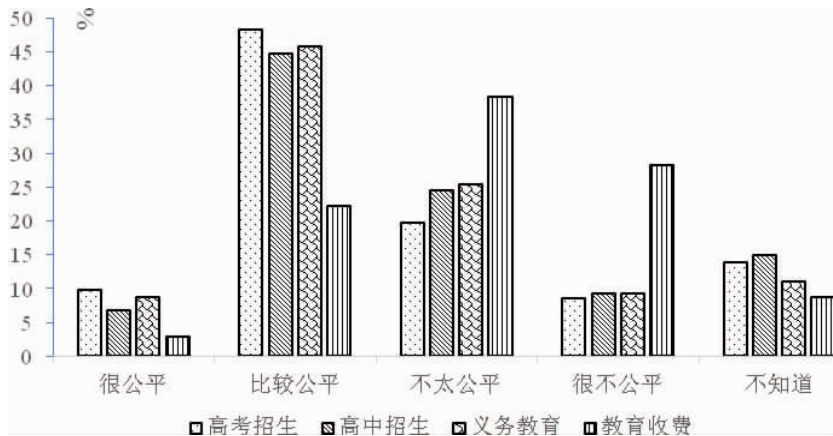


图1 教育公平感的总体分布特征

以看出，总体而言，对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公平性的评价要高于教育收费。认为教育收费“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的比重分别为 38.33% 和 28.13%，明显高于对任意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公平性的相应评价。而在不同教育阶段中，对高等教育招生公平性的认同感也要略高于高中招生和义务教育^①，认为“义务教育”和“高中招生”“不太公平”的比重也要略高于对高考招生的相应评价。因此，对于社会公众的公平观念而言，从图 1 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对教育公平产生不利影响的主要因素可能在于教育费用^②，这可能与家庭教育投入的不断上升存在密切的关联。

不同类型教育公平感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表 1 给出了不同教育公平感评价之间的 Spearman 等级相关系数和 Kendalltau-b 统计量的结果。其中 Spearman 等级相关系数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Kendalltau-b 统计量都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从表 1 可以看到，不同类型教育公平感的评价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① 由于本文调查样本只覆盖了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包括流动人口，这会导致对城镇地区不同教育阶段的机会公平性的高估。不难理解，流动人口等难以进入城镇公共教育体系的人群对于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评价。

^② 当然，这里的教育收费并没有明确区分学校的制度性收费和家庭的自主性教育投资。应当看到，家庭教育经费的上升，其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学校制度性收费的上升，而在于家庭自主性教育投资支出的上涨。

表1 不同教育公平感之间的相关性

	Spearman 等级相关系数			Kendalltau-b		
	高中招生	义务教育	教育收费	高中招生	义务教育	教育收费
高考招生	0.6446	0.3820	0.2913	0.6170	0.3529	0.2481
高中招生		0.4777	0.3386		0.4451	0.3079
义务教育			0.2978			0.2637

注：计算相关性时不包括选择“不知道”的情形。

(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变量：一是教育公平感；二是回答者的个体特征；三是家庭及子女特征。在教育公平感的四个问题中，都剔除掉“不知道”的情况，用0、1、2、3分别代表“很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和“很公平”，数值越大则表明公平感程度越高。总体而言，样本中个体对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要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关于不同阶段教育机会公平性的评价。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	2587	1.69	0.80	0	3	2
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	2554	1.58	0.79	0	3	2
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	2668	1.61	0.80	0	3	2
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	2741	0.99	0.82	0	3	1
性别(男性=1, 女性=0)	3000	0.39	0.49	0	1	0
年龄(岁)	3000	47.54	11.38	10	83	47
中共党员(是=1, 否=0)	3000	0.32	0.47	0	1	0
教育年限	3000	11.24	2.90	0	20	11
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是=1, 否=0)	3000	0.29	0.45	0	1	0
2006年家庭人均收入(元)	3000	15601.95	12924.61	1422.33	247776	12500
小孩年龄(岁)	3000	14.79	4.48	5	28	15
小孩年龄6岁	3000	0.0083	0.09	0	1	0
小孩年龄6—12岁之间	3000	0.142	0.35	0	1	0
小孩年龄12岁	3000	0.850	0.36	0	1	1
对小孩成绩的主观评价	1415	2.71	0.72	0	4	3
市区及以上重点学校(是=1, 否=0)	3000	0.23	0.42	0	1	0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2006 年小孩教育支出(元)	1415	3917.51	5206.71	0	48400	1900
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	1412	0.0045	0.05	0	1	0
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	2860	0.96	0.77	0	3	1

全部样本人群的回答者中, 男性人群比重为 39%, 女性多于男性。回答者平均年龄约 48 岁, 中值为 47 岁。20 岁以下 7 人, 60 岁以上 441 人。约 32% 的个体为中共党员。受教育年数的均值约为 11 年, 和中值相同。样本中, 约有 29% 的个体目前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由此可见, 本文样本中党员身份以及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者的比重可能相对较高。

收入均值约为 15601.95, 中值为 12500。1000 元以下 133 人, 10000 元以下 866 人。样本中家庭里小孩的年龄平均为 15 岁左右, 中值也是 15 岁。大部分家庭的小孩年龄在 12 岁以上, 约占总样本的 85%。对小孩成绩的主观评价分为“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很好”, 分别用 0、1、2、3、4 来表示, 由回答者本人主观判断。成绩的中值为“较好”。样本中市区及以上级别的重点学校比例约为 23%。家庭在 2006 年为小孩的支出约为 3917.15 元。“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约为 0.45%。这一比例偏低是因为这里也包含了非高等教育的阶段。在基础教育阶段, 学校提供的教育奖助学金和勤工助学岗位并不多。

由于不同类型的公平感评价可能具有相互关联性, 因此在后文扩展的回归模型中引入“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这个解释变量。我们采用问卷中“您觉得目前(2007 年)的收入分配状态公平吗?”问题的答案来度量。我们用 0、1、2、3 分别代表“很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和“很公平”。样本中平均值为 0.96, 几乎接近于“不太公平”。该变量的中值也是“不太公平”。

(三) 个体特征与教育公平感

本部分描述不同人群的个体特征与教育公平感评价之间的关联性。图 2 展示了教育公平感的四个维度在回答者性别之间的差别。对男性受访者而言, 在“高考招生”、“高中招生”、“义务教育”以及“教育收费”四个维度的平均公平感分别为 1.72、1.59、1.66 和 0.98。女性受访者在这四个维度的平均公平感为 1.67、1.56、1.57 和 1.00。从图中可以看出男性受访者在“高考招生”、“高中招生”、“义务教育”的公平感上平均而言要略高于女性, 尤其是在“义务教育”方面, 但总体而言, 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图 3 给出了党员和非党员在四个维度上的教育公平感的平均水平。作为

中共党员的受访者，他们在“高考招生”、“高中招生”、“义务教育”以及“教育收费”四个维度的平均公平感分别为 1.68、1.58、1.58 和 0.96。非党员在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公平感分别为 1.70、1.58、1.62 和 1.01。尤其在教育收费制度上的公平感，党员要低于非党员。图 4 给出了是否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和在其他机构工作的受访者对于教育公平感的主观评价差异性。作为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受访者，他们在“高考招生”、“高中招生”、“义务教育”以及“教育收费”四个维度的平均公平感分别为 1.64、1.52、1.61 和 0.97。其他受访者在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公平感分别为 1.70、1.60、1.61 和 1.00。平均而言，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受访者的平均公平感要低一些，这可能说明他们的子女并不一定从教育体系中获益，也可能说明他们由于更了解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细节从而产生了相对的不公平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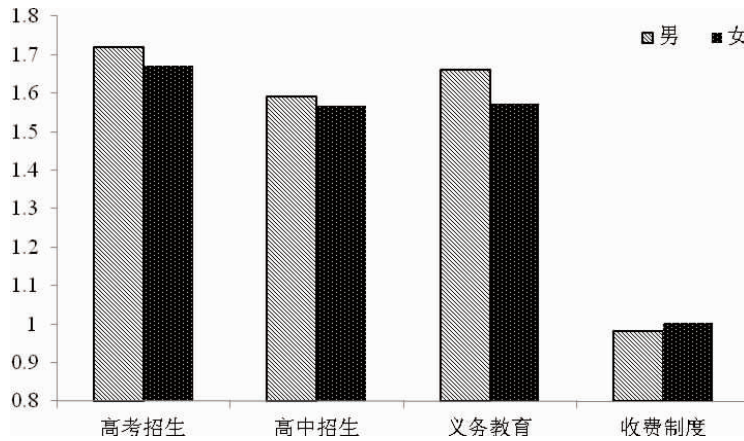


图2 教育公平感的性别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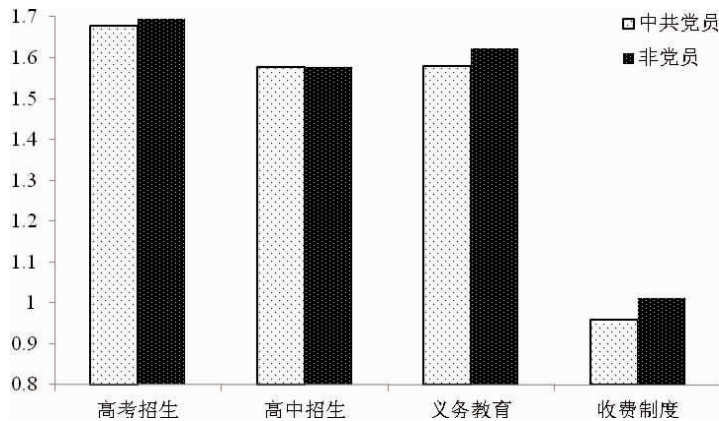


图3 教育公平感在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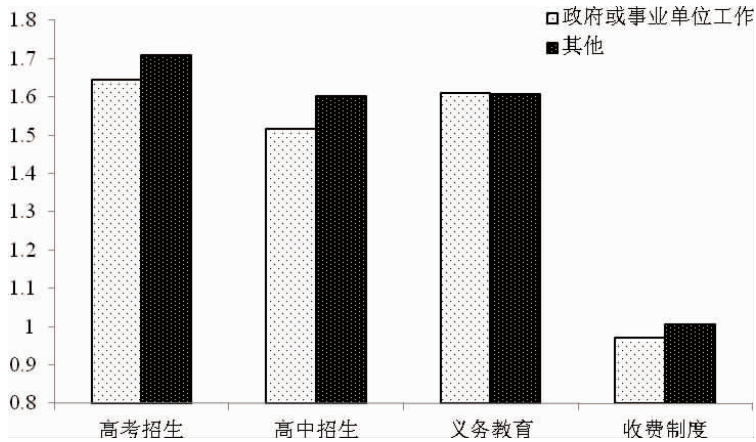


图4 教育公平感在不同工作性质的受访者之间的差别

教育问题以及居民对教育的公平感知不仅仅由教育系统本身的运行状况来决定，其他方面的社会特征可能也会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个初步尝试，我们在这里试图探索社会中另一个重要的功能体系——收入分配对教育系统的影响。我们在图5展示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和教育公平感之间的相关性。具体的，对应于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每一个答案，我们都计算出给出这一答案的人群中平均的教育公平感。从图中可以看出，教育公平感和收入分配状态的公平感具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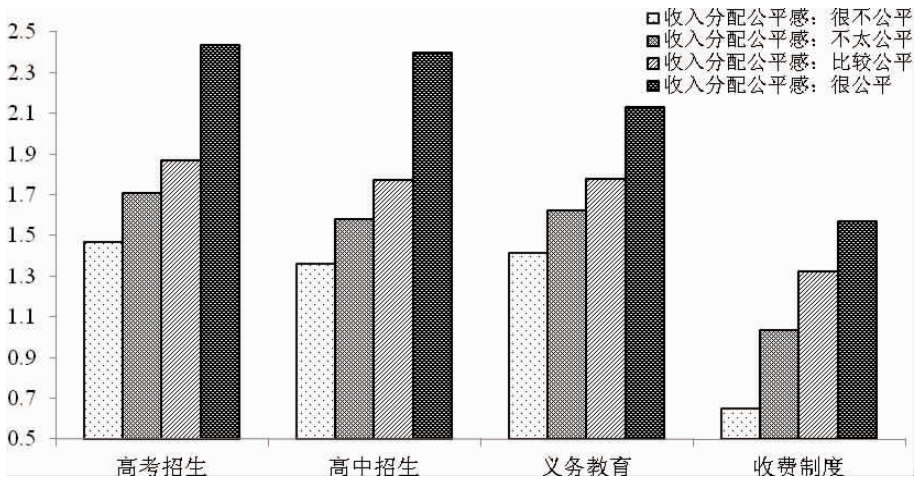


图5 教育公平感和收入分配公平感之间的相关性

(四) 家庭子女教育状况与教育公平感

图6给出了教育公平感和子女学习成绩的相关性。针对每一类学习成绩

的划分,我们计算出相应的教育公平感的平均值。关于高考招生,小孩学习成绩“一般及以下”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55,小孩学习成绩“较好”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68,小孩学习成绩“很好”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68。关于高中招生,小孩学习成绩“一般及以下”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41,小孩学习成绩“较好”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54,小孩学习成绩“很好”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56。关于义务教育,小孩学习成绩“一般及以下”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54,小孩学习成绩“较好”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60,小孩学习成绩“很好”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59。关于收费制度,小孩学习成绩“一般及以下”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01,小孩学习成绩“较好”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04,小孩学习成绩“很好”的受访者中的平均公平感为 1.06。总体而言,小孩的学习成绩和受访者的公平感正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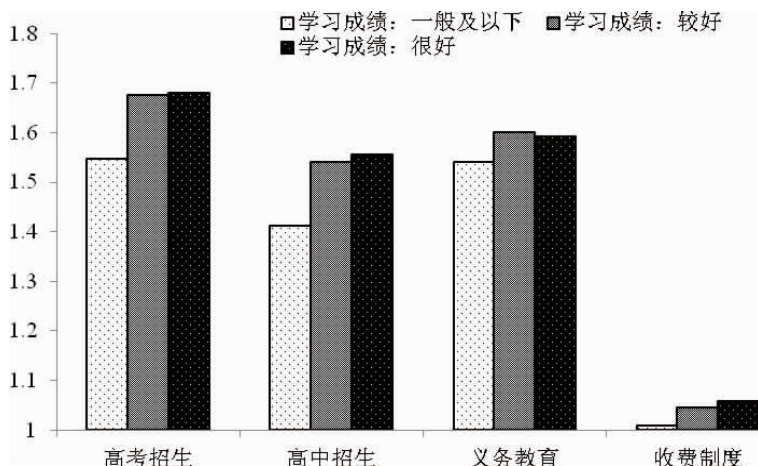


图 6 教育公平感和小孩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图 7 展示了教育公平感如何受到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我们把家庭教育支出分为前 50% 和后 50% 两组,比较这两组受访者的教育公平感。从图 7 中可以看出教育支出高的受访者在义务教育和收费制度中的公平感更低。这意味着合理化教育收费制度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有进一步的改进空间。

图 8 描述了教育公平感如何受到家庭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所占比例的影响。我们把奖助学金的比例分为前 50% 和后 50% 两组,比较这两组受访者的教育公平感。从图 7 中可以看出奖助学金的比例会改善受访者的教育公平感。这意味着进一步合理化奖助学金的体系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对教育的公平感和认可度。

图 9 展示了教育公平感如何受到小孩年龄的影响。图 9 显示,对于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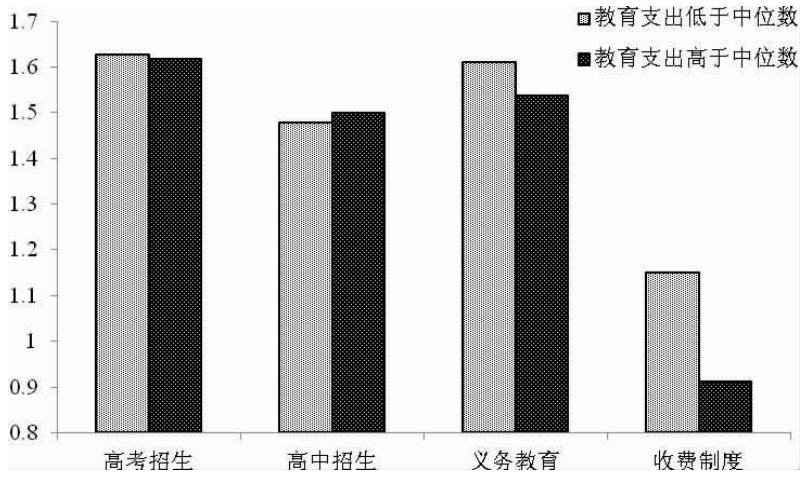


图 7 教育公平感和家庭教育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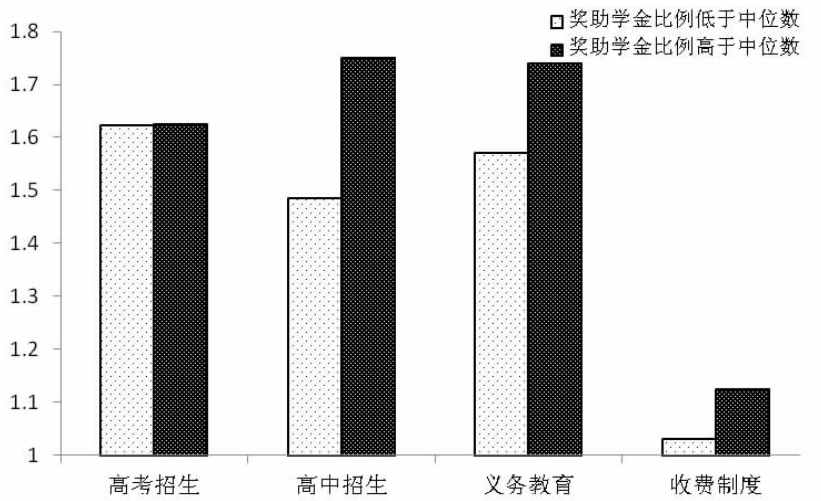


图 8 教育公平感和家庭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所占比例

和高中招生的公平感，小孩在 6 到 12 岁之间的受访者感到最不公平。而这类受访者群体关于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最强。义务教育制度的公平感随着小孩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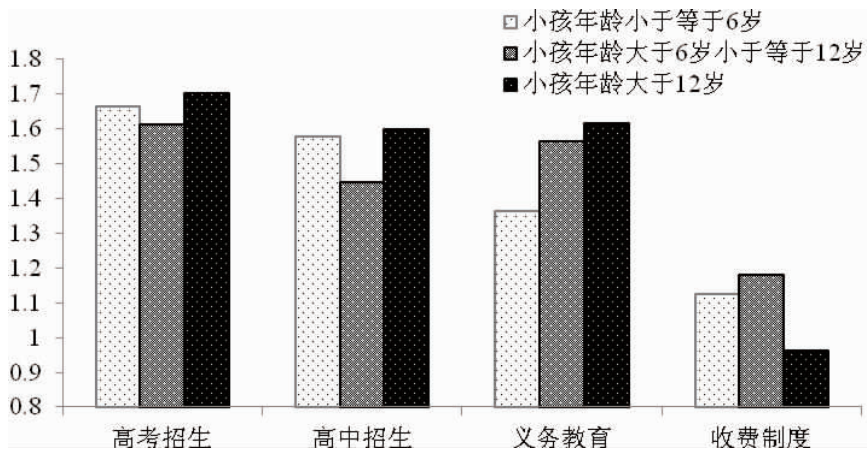


图9 教育教育公平感与小孩年龄

三、计量分析

为了讨论教育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了OLS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各种教育公平感评价，解释变量为表2中所列。我们也尝试过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与显著性都与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而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具有更为明确的含义。对教育公平感的解释变量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回答者的个体特征；二是家庭子女的基本特征，三是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认同程度。本部分的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出发，依次加入相应解释变量，以讨论教育公平感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特征与教育公平感

首先考虑一个基本线性回归模型，讨论受访者的个体因素如何影响教育公平感。表3给出了教育公平感如何受到受访者个体特征影响的回归结果。总体而言，性别对于教育公平感通常没有显著的影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制度的公平感评价以外。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方式，男性对其公平感认同程度要高于女性。反过来意味着，女性对义务教育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的认同程度要明显更低一些。这一结果可能与幼年子女通常更多地由母亲照料有关，这导致女性对于幼年子女的教育会有更多的投入，对相关制度的公平感也有不同的感知。

表 3 受访者个体特征与教育公平感

变量	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	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	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	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
男性	0.0466 (0.0337)	0.0145 (0.0334)	0.0771** (0.0336)	0.0247 (0.0336)
受访者年龄	0.00499*** (0.00158)	0.00585*** (0.00158)	0.00319** (0.00158)	-0.00258* (0.00157)
教育年限	-0.00757 (0.00632)	-0.0141** (0.00630)	-0.00787 (0.00627)	-0.00236 (0.00626)
中共党员	-0.0109 (0.0353)	0.0209 (0.0351)	-0.0493 (0.0353)	-0.0258 (0.0355)
目前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	-0.0525 (0.0368)	-0.0858** (0.0366)	0.0219 (0.0366)	-0.0229 (0.0366)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0811 (0.0308)	0.0734** (0.0305)	0.00502 (0.0302)	-0.00956 (0.0304)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330*** (0.295)	0.745** (0.292)	1.472*** (0.289)	1.069*** (0.290)
观测值	2587	2554	2668	2741
F 统计量	8.04	8.00	4.58	11.46
调整 R2	0.0265	0.0267	0.0133	0.036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 $p < 0.01$ ，** $p < 0.05$ ，* $p < 0.1$ 。

受访者年龄与教育公平感的关系非常值得关注。在关于教育机会公平感的三个问题中，受访者年龄的估计系数通常都是显著为正的，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相关招生制度公平感的认同程度越高。这种变化与我国教育机会总体而言是在持续增长的有关。相对更为充裕的教育机会可能会增强人们对于教育机会公平性的认同感。但受访者年龄在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的估计结果中则是显著为负的，即越是年龄大的受访者可能越不认同现行的教育收费制度。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于曾经低收费的教育制度会有更深的印象，对于教育收费的市场化观念可能也更加难以认同。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回答者年龄变量，没有考虑其二次项。一方面从经验结果来看，我们加入年龄二次项的结果显示，大多数情形下只有一个年龄变量是显著的，或者都不

显著；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教育公平感的影响机制而言，年龄的影响难以找到非线性的解释途径，因为无论是教育机会的变化还是教育经费制度的改变，总体上都是单向的，不具有时间序列上的波动性。

教育公平感随着回答者的教育年限增加通常是递减的。教育年限越高的受访者对教育公平感的认同程度通常更低一些，当然在多数情形下是不显著的，只有对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的评价具有统计显著的影响。这一特征与党员身份、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等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党员身份在不同类型的教育公平感中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仅凭党员身份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中可能不具有额外的区别性对待。但是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受访者，对高中招生制度的公平感评价显著地要低一些，而对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的认同感也要低一些（尽管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也许他们对于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更多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收入对于教育公平感的影响通常也都是不显著的，只是在高中阶段的招生制度公平性评价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特征是否与不同阶段教育机会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不同的关联形式，仍不得而知。从后文的相关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当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家庭收入对教育公平感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

（二）家庭（子女）特征对教育公平感的影响

在受访者个体特征的基础上，表4增加了家庭及子女特征对教育公平感的影响。除了“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之外，其他上文中提到的变量都作为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中共党员、教育水平、是否在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工作、（取对数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小孩的年龄、小孩的学习成绩、小孩是否上市区及以上重点学校、小孩教育上的支出、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表4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由于不同的公平感的维度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我们在回归中有针对性地控制了不同年龄段的虚拟变量。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感和高中招生制度的公平感的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小孩的年龄是否大于12岁这个虚拟变量。在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的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小孩年龄是否小于等于6岁和小孩年龄是否大于6岁且小于等于12岁这两个虚拟变量。在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的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小孩年龄是否大于6岁且小于等于12岁这个虚拟变量。

从表4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小孩成绩”对于高考招生和高中招生制度的公平感具有显著的影响。小孩成绩越好，则意味着越有可能从这些招生考试中获得相对较高的优势，从而对于相关制度公平性的认同程度就会更高一些。

事实上,“小孩成绩”在义务教育公平性的评价中没有显著效应。这也可能是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几乎与考试成绩的竞争性之间没有关联。这一结果也表明,通过考试的方式来决定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在社会公众中具有比较强的认同感。

表4 子女特征与教育公平感

变量	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	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	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	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
男性	0.0545 (0.0519)	0.0662 (0.0506)	0.138*** (0.0505)	0.0399 (0.0493)
受访者年龄	0.000879 (0.0034)	0.00573* (0.0033)	-0.000571 (0.0032)	-0.00158 (0.0031)
中共党员	-0.0648 (0.0531)	-0.0297 (0.0517)	-0.0821 (0.0518)	-0.0862* (0.0510)
教育年限	-0.0164* (0.0097)	-0.0156* (0.0094)	-0.0143 (0.0093)	0.00547 (0.0091)
目前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	-0.0322 (0.0554)	-0.0638 (0.0541)	0.0599 (0.0538)	-0.0347 (0.0528)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371 (0.0480)	0.0383 (0.0466)	-0.0263 (0.0458)	0.0390 (0.0447)
小孩年龄小于等于6岁			-0.275 (0.182)	
小孩年龄大于6岁且小于等于12岁			-0.0701 (0.0596)	0.00185 (0.173)
小孩年龄大于12岁	-0.00739 (0.0614)	0.00502 (0.0605)		-0.0466 (0.172)
小孩成绩	0.0954*** (0.0345)	0.0759** (0.0338)	0.0381 (0.0333)	0.00903 (0.0329)
小孩在市区及以上重点学校	0.0103 (0.0500)	0.0651 (0.0491)	0.0544 (0.0487)	0.0626 (0.0477)
小孩教育支出对数	0.0223 (0.0243)	0.00498 (0.0240)	-0.0295 (0.0237)	-0.112*** (0.0232)
所获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占教育支出比重	-0.103 (0.428)	0.594 (0.419)	0.0252 (0.428)	0.845** (0.422)

变量	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	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	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	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374*** (0.475)	0.619 (0.462)	2.063*** (0.460)	1.310*** (0.475)
观测值	1242	1255	1320	1349
F 统计量	4.75	4.01	3.73	9.34
调整 R2	0.0434	0.0348	0.0320	0.090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standarderror)；*** $p < 0.01$ ，** $p < 0.05$ ，* $p < 0.1$ 。

表3中所得的一些基本回归结果在表4中依然成立。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男性个体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要高于女性。受访者年龄会显著地正向影响其对高中招生制度的公平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共产党员的“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普遍偏低。这一结果说明了政治身份会显著地影响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和“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显著地受到受访者教育年限的反向影响。

小孩的年龄段对受访者的教育公平感没有显著的影响。小孩的成绩会显著地提高“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和“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这一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关注成绩上不处于优势的家庭对教育的公平感知。同时，小孩的成绩并不会影响义务教育和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教育支出越多，个体对“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和“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越低。这意味着合理化教育收费制度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有进一步的改进空间。同时，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会显著地提高“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这一结果有很直接的政策含义。提高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资助的力度可以直接提升居民对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

(三) 扩展的回归模型：考虑到经济社会其他部门对教育体系的影响

教育部门制定的教育政策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居民对教育体系的评价往往不只取决于教育体系本身，很多时候受到社会其他部门的影响。作为一个初步尝试，我们在这里试图探索收入分配体系对教育系统的影响。特别地，我们想研究个体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如何影响个体对教育系统的评价。因此，我们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这一解释变量。其他的解释变量和表4中相同。从表5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

知”对于各种教育公平感变量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可能表明，教育公平感的评价结果不仅取决于教育相关制度本身，也与社会总体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

跟表4的估计结果一样，在表5的结果中，男性个体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要高于女性。受访者年龄会显著地正向影响其对高中招生制度的公平感。共产党员的“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要显著地低于非党员。此时，小孩的成绩也会显著地提高“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和“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教育支出越多，个体对“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和“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越低。

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在综合考虑到社会其他部门对教育可能会产生影响时，出现了两点差异。首先，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在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关于“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要显著地低一下。这意味着工作单位的性质会显著地影响教育公平感。这一结果和党员身份对教育收费制度的反向影响，存在两种并不互斥的解释。有可能在政府及事业单位工作的家庭和家中有党员的家庭并不一定是教育体系的受益者，也有可能那些家庭的成员由于看到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很多过程和细节从而产生了相对的不公平感知。

此外，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不再显著地影响“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同时，受访者的教育年限也不再显著地影响其对高考制度的公平感。与此同时，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会显著地提升我们考察的所有维度的教育公平感。这说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作为一个看似教育体系之外的因素会影响着居民对教育公平的认知。这也意味着：（1）提高奖助学金和勤工助学的力度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来改善公民对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2）受教育年限会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来影响其对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感。

表5 扩展计量模型的 OLS 回归结果（考虑收入分配公平感）

解释变量	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	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	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	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
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	0.265*** (0.0302)	0.265*** (0.0296)	0.209*** (0.0299)	0.326*** (0.0285)

解释变量	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	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	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	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
男性	0.0353 (0.0513)	0.0424 (0.0498)	0.125** (0.0506)	0.0204 (0.0481)
受访者年龄	0.00304 (0.0033)	0.00757** (0.0033)	0.00147 (0.0032)	0.00133 (0.0030)
中共党员	-0.0735 (0.0525)	-0.0411 (0.0509)	-0.0796 (0.0519)	-0.106** (0.0497)
教育年限	-0.0150 (0.0095)	-0.0150 (0.0092)	-0.0136 (0.0093)	0.00731 (0.0089)
目前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	-0.0611 (0.0545)	-0.0930* (0.0530)	0.0360 (0.0539)	-0.0670 (0.0513)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529 (0.0479)	0.0206 (0.0463)	-0.0346 (0.0464)	0.0214 (0.0440)
小孩年龄小于等于6岁			-0.250 (0.1840)	
小孩年龄大于6岁且小于等于12岁			-0.0555 (0.0601)	-0.0927 (0.1690)
小孩年龄大于12岁	-0.0127 (0.0609)	0.0102 (0.0595)		-0.147 (0.168)
小孩成绩	0.0766** (0.0339)	0.0654** (0.0331)	0.0272 (0.0334)	-0.00551 (0.0320)
小孩在市区及以上重点学校	0.00607 (0.0493)	0.0438 (0.0483)	0.0394 (0.0489)	0.0338 (0.0466)
小孩教育支出对数	0.0289 (0.0240)	0.00791 (0.0235)	-0.0273 (0.0238)	-0.114*** (0.0225)
所获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占教育支出比重	-0.305 (0.460)	0.485 (0.450)	-0.178 (0.470)	0.547 (0.447)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220*** (0.473)	0.515 (0.458)	1.910*** (0.466)	1.257*** (0.467)
观测值	1199	1216	1277	1293
F 统计量	9.54	9.00	6.25	16.89
调整 R2	0.1024	0.0953	0.0654	0.172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 $p < 0.01$ ，** $p < 0.05$ ，* $p < 0.1$ 。

四、结论

本文运用家庭住户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居民关于教育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关于教育公平感的度量,我们考虑了四个维度:高考招生制度公平感、高中招生制度公平感、义务教育阶段分区招生制度公平感、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在这四个维度的公平感中,对教育收费制度公平感的评价最低,而各个教育阶段机会公平性的认同程度相对要高一些。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对于教育公平性的质疑可能更主要地来自于教育费用的不断上升。当然,对教育机会的公平感具有较高的认同也可能与本文的样本范围限定在城镇居民有关,没有包括流动人口以及农村居民,后两类人群对于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因为目前城镇公共教育体系在总体上并不接纳后两类人群。可以预期,改善后两类人群的教育可及性和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对于提高人们对于教育公平的认同感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及相应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性别、单位性质、小孩成绩、家庭教育支出、以及教育支出中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都会从某些维度影响教育公平感。作为首次运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教育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我们在这里只是发现这些个体因素和教育公平感的相关性。由于数据等限制,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尝试进一步考察他们之间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今后关于教育公平感的研究中值得考虑的一个方向。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教育公平感并不单一地取决于居民对教育系统的感知,还取决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感知。当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个体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这一变量之后,本文发现这一变量会显著地影响个体对教育体系的公平感。这个结果意味着,对教育公平感的认同与收入分配等其他维度的社会公平性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维度的公平感之间可能具有相互影响。

这些结果有着很直接的政策含义。提高居民教育公平感,可能并非教育系统自身努力能实现的,也与社会总体的大环境有关系。人们对于教育公平感的认同程度可能受到对社会总体的公正性评价的影响。人们对于教育公平感的观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的折射。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对于教育公平感的评价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本身;教育公平感的改善,可能并不仅仅取决于教育系统本身。

当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显著地影响教育收费的公平感知时,教育支出中

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所占比重,以及受访者的教育年限则对教育公平感知没有影响。这说明受教育年限会通过影响个体对收入分配体制的公平感来影响其对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感。同时,提高奖助学金和勤工助学的力度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来改善公民对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这意味着完善教育费用分摊机制,实现教育费用的公平分摊,对于改善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平感知将会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全国教育满意度测评研究”课题组,田慧生、曾天山、刘芳、马晓强、陈如平、单志艳、任春荣,2016:《基础教育满意度实证研究》,《教育研究》第6期。
- 成刚、孙志军,2008:《我国高校效率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
- 郝文武,2011:《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的关系状态和基本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胡洪彬,2014:《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2002—2012年CNKI期刊数据的分析》,《教育研究》第1期。
- 吉文昌,2015:《教育满意度测评方法与原则》,《教育研究》第2期。
- 刘泽云、邱牧远,2011:《高等教育质量收益的估计:基于倾向指数匹配法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孙阳、杨小微、徐冬青,2013:《中国教育公平指标体系研究之探讨》,《教育研究》第10期。
- 吴岩,2014:《教育公平视角下初中阶段教育补习现状研究——以广州市为例》,《教育研究》第8期。
- 薛二勇,2010:《论教育公平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教育研究》第10期。
- 杨娟、丁建福,2010:《构建县级政府教育职责评价指标》,《中国社会科学报》2月11日。

An Empirical Study on Fairness Percep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CHEN Ji-dong, LUO Chu-liang

(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five provinces in urban China, we empirically study fairness perceptions of education system. The fairness percep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dimensions, such as the fairness perception about

college admission, high school and compulsory schooling admission, as well as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We find that the fairness percep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depend on several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performance of their children, education expenditure on kids' education and fairness perceptions of income inequality. Specifically, individual sex, job characteristics, child grade, family expenditure, and the percentage of scholarship and assistance in the total expenditure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haping citizens' fairness perceptions of education system. In addition, the fairness perception of education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 factors and factors within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depends on citizen's fairness percep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It suggest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fairness perceptions of education needs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ociety other than the education system per se. We also find that, increasing scholarship of students could indirectly enhance fairness perceptions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channel of fairness percep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Key words: fairness percep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fairness perception of school admission system; fairness perception of educational finance system

(责任编辑: 杨 娟 责任校对: 杨 娟 胡咏梅)